



江苏创业投资

JIANGSU VENTURE CAPITAL

2021 年第 8 期（总第 210 期）

江苏省创业投资协会 主办

2021 年 8 月 31 日

聚焦	3
税制改革如何适应共同富裕？	3
算法、技术戴上“紧箍咒” “杀熟、二选一”等将面临更严 更细监管	7
理论周刊	11
社会保障制度 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11
为滥用人脸识别厘清法律边界	12
创业投资	13
“全民健身”狂潮下 PE/VC 押注的大众健身赛道有多火？	13
软银暂停中国投资或是个案 美元 PE 基金加码中国投资趋势 未变	15
教育	19
“双减”政策出台，校外培训如何夹缝求生	19
六部门共推教育新基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数字	

底座”	22
创业孵化	26
从 0 到 1 创业孵化机构如何点石成金.....	26
新生代硬科技孵化平台正兴起	28

税制改革如何适应共同富裕？

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聚焦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会议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等。

中国税务学会学委会原副秘书长、中国税务学会理事焦瑞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下一轮个税改革的重点不仅仅在于提高征税的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根据家庭的负担，根据家庭的收入来调节税收，合理设计劳动所得与财富所得的税收分配关系。将来未必直接强调提高直接税比重，而是通过宽税基低税率的方式，提高财政收入。

谈及对“富人税”的征收，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果希望三次分配能够积极发挥作用，那么就应先推出和完善房地产税和遗产税。因为以税收为主体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无条件的，而以捐赠、慈善为特征的三次分配其实是基于自愿、自觉的原则。如果代表二次分配的税制体系不完整，会直接影响三次分配的成效。焦瑞进还建议要注意“富人税”征了以后能否更好发挥作用。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等。视觉中国

共同富裕下的三次分配

我国税制正朝着降低间接税、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思路进行改革。

2020年12月23日，财政部部长刘昆曾撰写《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其中指出，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十四五”时期，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同时提高税收征管效能。此外，还要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我国的税制改革要怎么走？

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等。

中国税务学会学委会原副秘书长、中国税务学会理事焦瑞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三次分配的概念内涵是统筹三次分配关系，促进共同富裕，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第三次分配解决贫富差距。中央提出的“三次分配”的精神，包括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三次分配都设计好，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促进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

其中，在第二次分配中，可以通过逐步提高社保水平、利用税收调节和优化税制等三方面实现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第三次分配则是对于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大力鼓励给予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焦瑞进认为：“统筹用好三次分配关系，不仅仅是缩小现在的贫富差距，更大的意义是促进共同富裕。”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也认为，在不能否定初次分配重要性的前提下，二次分配中政府在“收”与“支”这两方面，以及三次分配都还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在税制改革中，应该更多从企业征税向个人征税转变，使得在给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让地方政府从注重招商引资转向更加重视人，从而打破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不统一、打破户籍限制。

宽税基低税率

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将适时推进。

刘昆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

个税法第七次大修将基本减除费用提高到 6 万/年，首次增加了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在内六大专项附加扣除等新措施。

焦瑞进认为，下一轮个税改革的重点不仅仅在于提高征税的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根据家庭的负担，根据家庭的收入来调节税收，通过合理设计劳动所得与财富所得税分配关系。目前社保和个税都是采取统一的税基，相较于高收入者，普通劳动者的负担会比较重。

我国正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焦瑞进建议，未来在分类上，是否劳动报酬方面纳税负担减轻一些，并增加投资所得等方面的纳税比重，通过不同的收入分类调节分配结构。社会财富或者人均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后，直接税比重自然会提升，再加上数字化手段的应用将能更有效掌握居民的实际收入情况。将来未必直接强调提高直接税比重，而是通过宽税基低税率的方式，提高财政收入。对于增值税，未来可能还是进一步并档降率。通过消费税等在最终零售环节征收，从而更高效地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

谈及个税改革如何适应共同富裕理念，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十四五”时期可进一步完善个税六个专项附加扣除的做法。目前六个专项扣除尽管从内容上看是比较完整的，能够基本反映个税纳税人的基本生活、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个人进修等领域的需要，但是，相关的专项扣除所反映的一些原则还有些模糊，有待清晰化；其次，进一步把个税的七级累进制加以简化，变成级次更少的税制。纳税成本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意愿相应提高，税务机关就能够收到更多的个税，从而政府部门就有更多的可支配财力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收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此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方式应该从代扣代缴逐步转为个人自动申报。

优化边际税率

目前我国个税法规定的最高边际税率仍为 45%。在上次个税法修正中，该项争议颇多。有观点认为，过高的边际税率不利于人才引进和国际竞争。

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江建平在第六届财经发展论坛上曾指出，高端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 45%还是高，呼吁降低到 38.2%的税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也认为，专门把高层次人才作为一个特殊的优惠群体来处理，确实对于促进创新、吸引人才等各方面有好处。

对于“十四五”时期的个税改革，此次不少受访专家认为，45%的边际税率实际上并未能有效应用。

焦瑞进表示，在实际工作中，纳税人会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调节分配关系。若是达到了 45%的个税边际税率，纳税人往往会通过注册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方式将更多收入以较低的税率进行缴税。

林江也指出，45%的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实际上难以执行。因为一般人只要不给自己开出每个月超出100万元的工资，多出来的收入以其他福利形式回馈给这位纳税人，就能够规避45%的最高边际税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临港新片区、海南自贸港等地都有出台个税优惠政策。

林江认为，在一些先行区、示范区等开始尝试相关的个税优惠做法，这对于相关的区域吸引优秀人才前来工作、生活至关重要。他建议，从现实的情况出发，倒不如调整45%的边际税率，总的趋势是调低该税率，例如调整为35%，然后再配合对个税收入类别的调整（按照大类收入征税）以及加强征管力度，让那些心存侥幸希望逃税的人知难而退。就能够基本实现个税体现社会公平原则的目标。

财富怎么运用才能更有助于社会发展？

为构建共同富裕，焦瑞进认为，税制改革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要丰富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和总量。比如，通过社会的发展、乡村振兴等提高纳税人收入。还比如，高收入者可以通过投资一些企业和项目，带动低收入群体充分就业，改变单一农业生产的局面。“这也是一种财富在社会中分配的形式，未来的社会治理体系要鼓励高收入群体拿出自己的收入参与更多的项目。”他表示。

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刘昆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也提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税、遗产税等“富人税”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林江坦言，如果希望三次分配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那么就应该先推出和完善房地产税和遗产税。因为以税收为主体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无条件的，而以捐赠、慈善为特征的三次分配其实是基于自愿、自觉的原则。如果代表二次分配的税制体系不完整，会直接影响三次分配的成效。

林江表示：“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最重要且最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恰好是能够给地方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进行融资的最好的渠道，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越高，老百姓越是安居乐业，共同富裕的目标就越能够实现。”

焦瑞进进一步提到，高收入者的财富如果用于炒房地产等，对这些行为要加大力度征税，“房住不炒”。但与此同时，富人税不是简单征收即可，而是要看“富人税”征了以后能否更好发挥作用。这些资产被征收后能否投入到生产经营环节，创造更多财富？哪种方式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如果通过三次分配等方式可以达成这一目标，不一定非要通过征收“富人税”的方式解决问题。

举例来看，8月18日，腾讯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并在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

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助力。四个月内，腾讯已连续规划投入 1000 亿元资金。焦瑞进认为，不仅是个人，高收入的企业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收入参与更多的项目，支持社会发展。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算法、技术戴上“紧箍咒” “杀熟、二选一” 等将面临更 严更细监管

导读：监管力度的增强、相关法律的细化，可见互联网平台算法、技术应用的“紧箍咒”越收越紧，平台经济的治理进入深水区。

链接封禁、大数据“杀熟”等网络领域特有的、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将被重点约束。

8 月 17 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直指网络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集中在平台封禁、大数据“杀熟”等热点问题的规制。

监管力度的增强、相关法律的细化，可见互联网平台算法、技术应用的“紧箍咒”越收越紧，平台经济的治理进入深水区。



对算法、技术的约束成为《规定》的关键词。视觉中国

禁止利用技术手段“二选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网络领域涉及不正当竞争的纠纷不断出现。

伴随网络经济发展模式从“增量竞争”向“存量竞争”的演变，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一些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技术加持”转移到线上，不正当竞争手段更加复杂且隐蔽。

2018年修订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根据网络领域反不正当竞争的客观需要，专门增加了针对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对利用网络，尤其是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了规制路径。但是该条款规定的比较原则，部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清晰。

结合近年来执法实践，《规定》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新的表现形式和行为构成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归纳提炼，分类进行规制。

对算法、技术的约束成为《规定》的关键词。近期备受关注的平台封禁与大数据“杀熟”，《规定》中均有涉及。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巍表示，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平台封禁”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四类：其一，平台经营者强制用户“二选一”行为；其二，平台经营者对其他平台或者应用内容不予直链行为；其三，平台经营者实施差别待遇行为；其四，平台经营者关闭API行为。其中，不予直链行为与关闭API行为都可归属于链接封禁行为外延范畴。

此次的《规定》中对“平台封禁”行为作出了规制。

比如，第三章对流量劫持、妨碍干扰、恶意不兼容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细化完善。具体包括：无正当理由，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屏蔽、拦截、修改、关闭、卸载，妨碍其下载、安装、运行、升级、转发、传播等；调整其他经营者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在搜索结果中的自然排序位置，并实施恶意锁定。

第四章重点列举和阐述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其中也提到对封禁行为等的约束。其明确表示：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限流、屏蔽、商品下架等方式，减少其他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机会，实施“二选一”行为，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并且，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限制交易对象、限制销售区域或时间、限制参与促销等方式，影响其他经营者的经营选择，实施“二选一”行为，妨碍、破坏具有依赖关系的交易相对方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扰乱市场公平交易秩序。

对平台封禁行为监管信号逐步明晰

其实,对平台封禁行为的讨论此前多围绕“反垄断法”的角度展开。此次《规定》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切入,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是对平台封禁行为更严格的监管模式。

翟巍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平台封禁行为既可由《反垄断法》规制,又可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但是有的企业虽然具有链接封禁、屏蔽行为,其并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很难用《反垄断法》来规制。

“监管层释放的信号比较清晰。”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陈兵表示,当《反垄断法》在适用互联网领域新型竞争纠纷或者竞争违法行为,调查、取证难度较大情况下,可以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算是换一种思路推动对互联网领域不公平竞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4 月 13 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会议明确提出,网络平台企业要做到“五个严防”和“五个确保”,其中强调,应当“严防网络平台企业实施系统封闭行为,确保生态开放共享”。

7 月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称“启动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将重点整治恶意屏蔽网址链接和干扰其他企业产品或服务运行等问题,包括无正当理由限制其他网址链接的正常访问、实施歧视性屏蔽措施等场景。

可见,无论从市场经营角度还是行业监管角度,平台的链接封禁行为监管趋严。

对大数据“杀熟”加强监管

近年来,利用算法滥用个人信息、甚至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网络应用通过用户画像向公众提供个性化推荐和精准服务,有的人感觉隐私被“围观”,还有的人更是遭遇“大数据杀熟”。

此次,大数据“杀熟”的问题在《规定》中有了回应。

《规定》第二十一条指出,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通过收集、分析交易相对方的交易信息、浏览内容及次数、交易时使用的终端设备的品牌及价值等方式,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方不合理地提供不同的交易信息,侵害交易相对方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扰乱市场公平交易秩序。

翟巍解释称,这个是针对“差别待遇”形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大数据杀熟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对大数据“杀熟”要求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都会产生关联。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对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作了有针对性规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保证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的公平、公正,

不得通过自动化决策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并在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

陈兵解释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对用户人格权益的保护，保护的是个人信息安全，而《规定》则从市场监管角度出发，更强调消费者财产权益的保护。

那么，未来对大数据“杀熟”等行为的监管如何落实，是否会产生执法竞争的情况？

翟巍认为，监督执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确保监管手段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从而及时识别平台企业滥用数据、算法侵权行为。对此，监管机关还需要考虑如何有效提取与固定违法证据。

陈兵认为，未来或许会出现对同一行为进行不同处罚的情况，需要通过部际联席会议等新的监督协作机制来解决。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社会保障制度 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近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第七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在京举行，会议主题为“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会上表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加大社会保障再分配力度，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就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行动。

郑功成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物质基础是否丰厚决定着可供全民共享的潜在份额；二是再分配机制是否合理决定着全民共享的公正程度。中国需要继续保持经济较高速度的增长，同时更加重视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经济建设的成果要通过社会保障惠及全民，社会保障的改革深化要有助于经济发展。

“从国际视野出发，社会保障制度越是健全的国家，国民共享的份额就越大、社会平等与公正的程度就越高、离共同富裕目标的距离就越近”他指出。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既不可能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更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是全体人民解决后顾之忧、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它构成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制度支撑，也必定是未来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

他认为，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力度不足是一个客观事实：一是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过大，不同身份或岗位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同，有的制度安排甚至存在逆向调节现象；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不充分，主要表现为幼儿、妇女及残疾人三大群体的服务供给滞后，需求高涨与满足有限存在较大落差，影响到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也直接制约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步伐。

他指出，增强社会保障再分配力度包括五个着力点：一是全面优化现行制度安排。关键是在坚持共建共享、互助共济的原则下，增进公平性、缩小待遇差距，而整合相关制度安排、均衡筹资责任、提高统筹层次、打破户籍壁垒、统一待遇清单与标准是必由之路。二是加快弥补社会保障的短板。关键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发展养老服务、儿童及妇女福利事业，不断增强供给的有效性。三是持续提高社会保障共享份额。关键是加大公共投入力度，同时拓宽资金来源。要以中等发达国家为参照，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之比，同时提高个人缴费责任，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和个人及家庭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积极性，这是持续壮大社会保障物质基础的重要途径，也会持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为滥用人脸识别厘清法律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日前发布，对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小区“刷脸”进门、手机 APP 捆绑个人信息、未成年人人脸信息保护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规定》从人格权和侵权责任角度明确了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行为的性质和责任。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广泛用于现实生活，民众对其被滥用的担心也不断增加，强化人脸信息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把未经自然人或其监护人单独同意的人脸信息采集行为明确界定为“侵权”，这不仅回应了民众呼唤保护人脸信息的正当诉求，也为司法部门处理此类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更增强了公民对其人格权益保护的底气。

相较于此前的指纹比对、虹膜扫描、语音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则是通过对人的面部特征扫描来识别或验证某个人的身份信息。这是生物识别信息中社交属性最强和最易采集的个人信息，具有唯一性、敏感性和不可更改性。一旦人们的“生物密码”被非法采集和滥用，极易危害到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公共安全。比如，有人戴上高清 3D 面具，配合系统指令做出相应动作，就可以实施各种不法行为，演绎出现实版的“变脸”，其社会危害性不可小觑。尤其是当人们将手机支付宝或微信支付与人脸识别绑定时，就可通过刷脸支付自动完成。

鉴于人脸识别技术已被广泛应用的社会现实，最高法在《规定》中并未对其提出一刀切的“禁令”要求，而是着意人脸信息采集行为的制度性规范和公民知情权、人格权保护。《规定》明确，处理自然人的人脸信息，必须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违反单独同意，或者强迫、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构成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这就为经营场所采集、使用消费者人脸信息的行为划定了“可为”与“不可为”的法律边界。

落实“滥用人脸识别属侵权”的法律新规，需要经营场所管理者学法、知法、自觉守法的自制与自律，也需要广大消费者对任何违法的人脸信息采集行为持零容忍的态度，更需要执法者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刚性履职。

来源：经济参考报

“全民健身”狂潮下 PE/VC 押注的大众健身赛道有多火？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统计，2020 年健身市场投融资活跃度提升，全年共发生 47 笔融资事件，较 2019 年增长 58.62%，已披露募集总金额达 50.15 亿元人民币。

不同于竞技体育的激烈与残酷，当代中国健身画卷中，最具公共性的一隅，恐怕莫过于广场舞“大妈”和公园养生“大爷”们的日常锻炼。区别于健身房中的“健身”概念，大众健身总是与广泛意义上的体育运动联系在一起，是一般人为增强体质而从事的体育锻炼或是公共性运动。

在线健身获追捧

如今，健身房和跑步机逐渐成为现代人都市生活的标配，在平民化健身的选项中，除了公共空间的广场舞、太极拳及马拉松等，还增添了可在家使用的健身 APP。据移动数据和分析平台 App Annie 统计，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健康和健身 APP 用户消费支出增长了 30%，APP 下载量增长 30%。利用智能手机，健身 APP 降低了健身的门槛和成本，新手可随时享受免费或付费的健身指导。

“中国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大众消费特别是对健康消费的热情正在不断提升，因此我个人是非常看好大健康方向的。在此基础上，健身肯定也会是未来非常大的发展方向，这个市场还有着极大的迭代升级和爆发式增长的空间。”金沙江创投主管合伙人朱啸虎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随着 AI 技术的应用，人们健身的场景会更加多样化。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统计，2020 年健身市场投融资活跃度提升，全年共发生 47 笔融资事件，较 2019 年增长 58.62%，已披露募集总金额达 50.15 亿元人民币。其中，在线健身平台与智能健身领域最受投资人的青睐。

投融资频次增快

2020 年始，大众对于个人健康状况尤为关注，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在个人健身及健康管理上。据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发布的《2020 年大众健身行为和消费研究报告》统计，有 63% 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内发生了体育服务类消费，有 44% 的受访者称其健身消费投入高于往年。

受惠于此，健身市场投融资活跃度在 2020 年也有明显提升，近半企业融资规模在千万元左右，有 9 笔融资规模过亿元。其中，从事健身器材生产的舒华体育（605299）于 2020 年 12 月在上交所上市，募集资金 3.64 亿元。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后发现，从融资轮次看，去年健身领域过半融资集中在 A 轮及以前，其中种子轮 1 起，天使轮 6 起，Pre-A 轮 7 起，A 轮 12 起。

尽管融资多处于早期，但也有多家公司在较短时间内接连获得 2 轮融资，如大众健身领域在线健身平台 Keep 在去年 5 月和 12 月分别获得 8000 万美元的 E 轮融资和 3.6 亿美元的 F 轮融资。另外，家用健身器材生产商金史密斯更是在 2020 年下半年中接连获得 3 轮融资，融资规模均在亿元以上。融资频次的增快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着资本对公司的运营模式、市场地位及赛道发展前景的认同。

据《中国体育健身器材市场景气指数分析报告》显示，2020 年第三季度景气指数达到 70.4，环比增长 21.7%，同比增长 16.7%，这也从一个维度解释了研发生产智能健身硬件的金史密斯连获 3 轮融资的原因。

从大众自身需求进阶的维度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普通人群也更乐意重视自身的生活品质，且更愿意接受健康生活的理念。据上海体育学院发布的《2021 年中国健身趋势》报告显示，有 86% 的受访者未来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运动上，80% 的受访者将增加健身活动相关消费。

从投资领域看，2020 年的投资主要涉及健康食品、在线健身平台、智能健身、运动鞋服、健身器材、少儿培训和运动康复等。健康食品、在线健身平台、智能健身最受资本青睐，在线健身平台共获得 7 笔投资。

“健身文化一般是从中高端往下走，这和传统的互联网打法其实并不一样，线下更偏时尚文化，中高端是比较好的路径。”朱啸虎认为，在健身场景将被空前拓展的趋势下，只有围绕智能硬件终端，并针对用户对于健身内容、交互的需求做出最好的产品体验，才能真正地抓住用户。

2020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互联网+健身”，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利好政策的出台，加之大众居家时间延长等因素，极大拉动了“大众健身，全民健身”的市场。

另一方面，受益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智能健身领域获得资本较多关注，集中基于数据采集、动作捕捉等技术的智能管理系统、智能交互、AI 教练等技术领域。

（本文系 21 世纪创新资本研究院行业投融资研究成果。）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软银暂停中国投资或是个案 美元PE基金加码中国投资趋势未变

多位美元 PE 基金人士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目前他们仍保持原先的中国项目投资节奏。

一石激起千层浪！

11 日，软银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孙正义表示：“在中国投资方面，我们注意到很多新的监管措施陆续出台，我想再等一段时间，以观察（中国相关部门）监管类型、监管范围及其对市场的影响。在形势更加明朗前，我们想静观其变。一两年后，我相信新规则将创造一个新局面。”

孙正义的这番表态，骤然引发软银或暂停中国投资的猜测。

部分 PE 人士猜测，软银此举可能会成为全球 PE 资本暂缓中国投资的“风向标”。毕竟，中国加强反垄断监管、数据安全保护、整顿在线教育培训行业的政策共振，加之美国 SEC 要求赴美上市中概股必须加强政策风险披露，可能令越来越多美元 PE 基金基于规避日益严格的政策风险的考量，暂缓中国投资。

不过，多位美元 PE 基金人士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软银或是“个案”。目前他们仍然延续以往的投资节奏。

“本周我们刚完成两个项目的股权投资商务条款谈判并签订投资意向协议。”一位美元 PE 基金投资总监向记者直言。不过，针对政策监管风险加大，他们对投资策略做出了某些调整：一是，大幅减少政策风险偏高的赛道（比如 2C 端互联网+）投资；二是，增加硬科技（比如半导体研发、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生物医药、新材料）的投资比重，以及支持投资企业转道港交所或 A 股市场 IPO。

“此外，我们还优化了项目投资逻辑，以往看重投资项目实现业务快速扩张以实现市场份额最大化，进而创造高估值 IPO；如今要求投资项目先落实各项监管要求，优先确保合规操作，再寻求稳健增长。”他指出。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软银暂停中国投资传闻，也悄然影响全球 LP 对（投资中国的）美元 PE 基金的投资热情。

“目前 LP 市场出现某些波动，部分欧美富豪家族办公室 LP 可能会效仿软银做法，等待中国政策监管细则更加明朗化，再开展美元 PE 基金的注资；不过，欧美大型养老基金与大学基金仍然保持以往的追加投资节奏，他们更看重美元 PE 基金在政策监管新变化环境下，能否保证预期的内部回报率 (IRR) 与现金回流率 (DPI)。”一位全球 PE FOF 机构亚太区负责人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一家大型美元 PE 基金合伙人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为了打消这些 LP 对中国政策监管的顾虑，他们正着手构建数字化的风控模型，给投资项目贴

上标签，比如投资成本、企业估值、PE 倍数、行业地位、政策监管风险等，并将这些标签与股权投资潜在回报率紧密相关，形成相关性分析，以便 LP 能通过这些风控模型参数了解项目的投资回报风险比，从而提升对美元 PE 基金投资水准的信心。

软银暂停中国投资“探因”

在多位 PE 业内人士看来，软银或暂停中国投资，可能有其特殊性。

“概括而言，就是软银的很多投资项目都撞在枪口上。”上述美元 PE 基金投资总监表示。比如软银斥巨资投资的滴滴、满帮、作业帮、阿里巴巴等项目，都因遭遇中国加强反垄断监管、数据安全保护等政策遭遇股价较大幅度回落，某种程度拖累了软银业绩表现。

8 月 10 日，软银集团公布截至 6 月底的 2021 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当季软银净利润达到约 69 亿美元，较去年同比下跌 39%，创下集团过去 5 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利润下滑。其中，软银旗下愿景基金当季利润约合 21.4 亿美元，同比下滑 3%。

软银对此解释称，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所投资企业的收益减少，以及缺乏大型 IPO 活动。

在他看来，因监管政策所引发的投资项目回报不确定性，很可能是触发软银或暂缓中国投资的直接导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加强反垄断监管起，4 月以来软银愿景基金已着手压缩中国项目的投资力度，令中国项目投资占比降至约 11%。

一位熟悉软银投资策略的 PE 机构人士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软银或暂缓中国投资，还与其自身投资风格息息相关。一直以来，软银的投资策略相当激进——他们往往会向某些热门赛道企业投入巨资，扶持后者迅速扩张并取得极高市场份额，从而实现项目高估值上市与获利退出。比如软银向滴滴累计投资额逾百亿美元，支持滴滴成为国内出行领域龙头企业以博取资本回报最大化。

“以往，由于很多国家对新兴产业的反垄断监管政策尚未跟上，这种激进投资策略一度被视为行之有效的股权投资获利模式。如今各国都加强相关反垄断监管，这种投资策略已然行不通。”他分析说。或许软银内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重新制定新的投资策略前，他们只能先暂缓中国投资。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此前软银集团比较侧重 2C 端的中国新兴产业投资，因为 2C 端赛道具有极高的成长爆发力，能满足软银“高投入创造高估值、高收益”的投资逻辑。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对 2C 端新兴产业加强数据安全保护，软银或需重新评估这个投资赛道所面临的新政策监管风险，不得不先暂缓中国投资。

美元基金加码中国股权投资节奏“未变”

软银或暂缓中国投资是否会触发“跟风效应”，俨然成为近日 PE 市场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

多位美元 PE 基金人士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目前他们仍保持原先的中国项目投资节奏。

“过去半个月我们刚签订了三个项目的投资意向协议，还有若干项目正在完成尽职调查，丝毫没感受到中国项目投资步伐放缓的迹象。”一位美元创投基金董事总经理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不过，针对中国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政策，他所在的美元创投基金投资策略也做了不少调整。比如他们大幅减少针对 2C 端互联网+赛道的项目考察，转而投入更多精力关注硬科技的投资机会，包括半导体技术研发、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此外，他所在的美元创投基金转而支持中国项目转道港交所或科创板上市。

“此前有 LP 担心项目境内 IPO 退出可能遭遇资本管制，令投资本金收益无法换汇返回境外，对此我们专门和这些 LP 做了沟通，通过以往成功案例做了解释，证明美元基金投资项目实现境外募资、境内退出、收益返回境外是完全畅通的。”他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

令他颇感意外的是，近期部分中国企业担心美元基金可能暂停投资，反而主动调低了企业估值，让基金无形间获得更优惠的股权投资价格。

在多位 PE 业内人士看来，相比美元基金延续以往的投资节奏，LP 市场因软银或暂停中国投资传闻掀起了些许波澜。

“近期有些欧美富豪家族办公室 LP 可能会借鉴软银做法，等待中国相关政策明朗后再继续投资。”前述 PE FOF 机构亚太区负责人指出。不过，这类 LP 占比不高，美元基金的最主要出资方——欧美大型养老基金、FOF 机构与大学基金等长期投资机构仍然延续针对中国市场的 PE 投资力度。

目前，这些长期投资机构认为中国一系列政策监管，反而是考验 PE 基金投资水准与应对能力的试金石。若 PE 基金能提前洞察相关政策风险而减少教育培训等赛道投资，或通过其他资本运作方式妥善处理相关项目尽可能保障投资回报，无疑将成为他们新一期美元基金募资的加分项。

这位 PE FOF 机构亚太区负责人还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目前他们对美元基金是否追加注资，仍然以后者能否创造预期的 IRR（内部回报率）与 DPI（现金回流率）作为主要参考依据。事实上，众多国际大型养老基金、大学基金与 FOF 机构在过去数十年经历多次金融危机，已积累了成熟的市场风险与政策风险应对策略，目前中国监管政策所带来的 PE 投资退出挑战，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调整美元 PE 基金遴选标准从容应对，从而保障自身的长期回报要求。

他直言，近期他与部分大学基金沟通发现，这些美元基金 LP 开始复盘 PE 基金以往的投资项目，若 PE 基金过度投资存在较高政策风险的赛道或项目，则

表明他们对潜在政策风险的敏感度与预见性偏弱,不排除会压缩对后者的追加投资力度;反之 PE 基金通过分散化投资或提供全面增值服务助力项目保持稳健成长实现预期回报,则倾向追加投资。

“毕竟,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率先实现企稳反弹,加之高科技发展驱动众多产业具备极强的增长动能,令全球养老基金、大学基金都不愿错过巨大的投资机会。”这位 PE FOF 机构亚太区负责人强调说。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软银或暂停中国投资传闻不断,软银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纳夫尼特·戈维尔明确表示,虽然中国政府监管行动影响了回报预期,但软银愿景基金对中国市场的投资观点没有改变——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机会。

来源: 21 世纪经济报道

“双减”政策出台，校外培训如何夹缝求生



视觉中国供图

减负并非一减了之，要加强公共教育供给，使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要大力推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只有教育均衡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学生负担过重的难题。要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一纸文件，为原本狂飙突进的校外培训按下刹车键。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

这被称作“双减”政策。

资本市场是敏锐的，在《意见》流传开来的那一天，教育股应声暴跌。文件中明确指出，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是从党之大计、国之大计角度作出的重大安排。”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表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贯彻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问题。负担减轻了，才能真正做到“五育”并举，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校外培训无序发展破坏教育生态

“双减”政策的总体思路很清晰。

首先，还是着眼校内，这是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坚持应教尽教，着力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水平和课后服务水平，让学生学习更好地回归校园，在校内“吃饱”“吃好”，减少参加校外培训的需求。

然后，是系统治理。政策不仅聚焦在作业和校外培训两个方面，在加强课后服务、减轻考试压力、完善质量评价、营造良好生态等方面同样作出部署，系统性、全链条推进“双减”工作。

不过，政策出台后，舆论更加关注的，还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全面规范。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据统计，目前全国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十分巨大，已基本与学校数量持平，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不仅会增加学生课外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还会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而且这些培训机构违法违规情况突出。由于违法违规成本较低，导致无证无照机构屡禁不止，虚假宣传、超前超标、乱收费、与中小学招生入校挂钩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然存在，机构倒闭、卷款跑路等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仅如此，校外培训机构被资本裹挟状况严重。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培训行业，展开“烧钱”大战，广告铺天盖地，对全社会进行“狂轰滥炸”式营销，各种贩卖焦虑式的过度宣传，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

所以，需要针对这些突出问题采取举措。

《意见》出台后，一些分析人士建议培训机构“放弃幻想”。校外培训业似乎进入了“静默期”。最近出现的培训机构相关新闻，都与裁员有关。

文件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如今正值暑期，有媒体探访曾被戏称为“宇宙培训中心”的海淀黄庄。如今，曾经热闹的、挤满培训机构的大楼，变得冷清起来。

培训机构在观望也在寻求转型

一家做语文培训的小型机构负责人蒋胜（化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打算转型，做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培训，说白了，就是把以前的内容换个面貌，重新推出，“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管理细则，还不知道这些培训能不能做。”

更大的培训机构已经宣布推出新产品，开拓更多领域。

前不久，网易有道推出6款素质教育产品，包括少儿编程、围棋、科学、美术、机器人等内容；少年得到的产品“泉灵的语文课”，改名为“泉灵的素养课”；猿辅导宣布做素质教育，上线“南瓜科学”；好未来整合了成人教育等多项业务；因为外教政策受到冲击的VIPKID，也在酝酿成人教育……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圣足指出，对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强化素质导向，引导转型发展。在大力推行中小学校内课后托管和服务的同

时，综合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房屋租金减免、财政贴息贷款及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和鼓励现有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转向素质教育领域，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科技、劳动和体育等课后培训活动，以补充全日制中小学校的短板和不足。同时，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存量培训机构剥离学科类培训业务，探索实行职业技能培训乃至学历性职业教育，并可与公办学校开展合作办学、实施委托管理。

但转型并不容易。

蒋胜坦言，K12（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是两个赛道，两种经营模式和人才需求。其实新东方、好未来、猿辅导等很早就在做兴趣教育，但一直不温不火。因为“双减”政策，这些项目被迫走向台前。“素质类教育，说服家长付费的难度大于学科类培训，而且学生的黏度也不高。”他表示，现在不少机构都在谋求转型，也就意味着素质教育的竞争者也是一窝蜂出现了，后面是什么情况，还很难讲。

“所以现在大多培训机构还在观望。”蒋胜表示。

要治“本”还得最大程度满足教育需求

因为摸不清风向，蒋胜想停课。但家长们主动向他提出，可以私下组班，“静静鸡娃”。

正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所说，培训的形态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只要培训需求没有减少，校外培训机构依然可能隐藏踪迹，继续存在。

教育焦虑也还是存在。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表示，面对家长的现实需求，如何真正落实好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最大程度满足教育需求，成为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关键。毕竟大机构需要合规，但空出来的市场，可能会让小机构甚至个体户乘虚而入。

“减负并非一减了之，要加强公共教育供给，使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顾明远说，首先要大力推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只有教育均衡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学生负担过重的难题。要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要深化教育改革，把课堂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主渠道，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把每一节课上好，使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都能听懂学会。而且学校、家庭、社会都要对学生课余时间负起责任，提供公共教育服务。比如现在各地教育部门都已经出台了托管措施。托管班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帮助学生完成家庭作业，一部分时间组织各种兴趣小组，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成长。各种兴趣班也可以请校外具备相应资质的专门技术人员、非遗传承人、志愿者来参加辅导。

规范校外培训，不是要将校外培训一棒子打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指出，校外培训机构在兴趣爱好类的校外教育供给方面具有优势，在学科教育方面也可以补差，但不能违背规律进行超纲教学、应试教学。他提醒，政府要履行在提供公共教育服务中的责任，支持学校开展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并统筹考虑教师的工作负担和相应报酬；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包办的现象。严格规范校外教育培训，也要注意发挥教育培训市场的有益补充作用。

来源：科技日报

六部门共推教育新基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数字底座”



视觉中国供图

教育新基建面向未来，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这个支撑体系将助力破解教育均衡、家校协同、师生减负等教育难题，推动教育模式变革、流程再造和生态重塑，有效提升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创新创造人才。因此，推动教育新基建要跳出技术的逻辑，从教育生态构建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去勾勒发展蓝图。

——雷朝滋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

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教育新基建，本质上是教育信息化的2.0版本，它不仅包含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等新型基础设施，还包括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书生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技术已经成为教育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影响、改变并重塑了

现代教育关系，“人、技术、自然”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自组织结构推动了教育新生态的形成。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已然开始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大中小学生宅家数月。但是，受益于教育系统信息化的建设成果，各地普遍实现了“停课不停学”。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互联网接入率达到100%，95.2%的中小学拥有多媒体教室。

早在十年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铭副教授就把线上与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到实践中，疫情让他和许多老师的在线教学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从最初的教学时空延展，到评价方式的多维性和精准性，再到智慧教室和虚拟现实的应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应用让他深深体会到新基建对教育改革的强大助推作用，“我认为这种变革是从4个方面逐层递进的，首先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理念发展；其次是新技术的支撑；在此基础之上外化为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此实现信息技术赋能于教育领域，最终呈现教育教学的新样态”。

根据多年研究，沈书生将我国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大致分为3个阶段：一是技术参与教育的阶段，重点关注如何借助技术改变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二是技术变革教育的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启动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工程，教育界开始依靠技术改变教学形态，重点关注如何借助技术来改变和调整教学过程；三是技术优化教育的阶段，2013年我国启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借助技术转变教育思维、改进教育质量受到广泛重视。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密集而迅速，教育信息化也迎来了新网络、新平台、新安全、新资源、新校园、新应用等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高潮。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加速迭代，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传统教育生态不断受到冲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已然开始。”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教育专场活动上，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也表示，推动教育新基建，将加快技术的演化和发展，在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上发挥加速器的作用，促进信息技术下的教育教学变革。

核心价值在于学习者的健康成长

当前，我国5G网络加速成型，但山区的孩子却需要爬到山顶才有信号上网课；北京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使用同一本教材，却因为不同的课件产生不同的理解；网课上完了，学生学得怎么样，老师并不完全掌握……

2020年，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注意到一个现象，“差不多所有的学校、老师都在做课件、上网课，几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朱永新说，这也造成了教育质量不平衡，出现两极化的现象。

对此，雷朝滋也表示，教育信息化保障水平距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

高质量教育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目标。“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仅是每一位公民应有的权利，也是考察教育新基建这个“数字底座”能否筑牢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关键。

刘铭已将他任教的所有课程全部上网，“现在的技术手段能够实现学生在线签到，统计学习资源浏览率、讨论参与率、在线作业完成率等多维度在线学习行为数据。这些数据能帮我分析每个学生的在线学习状态，并与学习成绩进行关联分析，这对教学质量的提升非常显著。”刘铭说，学校和老师都要积极探索和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教学中的实践，开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

新基建无疑将进一步补足教育信息化短板，提升教育质量。但是，实现教育革新，还需要弄清楚教育领域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如果发现不了问题，革新就无从说起。

沈书生表示，教育信息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学习者的健康成长。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教育，但是判断技术效能的关键指标只有一条，那就是尊重学习规律，促进学习者的健康成长。

同时沈书生还指出，合适的学习支持才能实现教育信息化核心价值。借助于现代技术的支持，教师可以记录学生行为，并可以对学生的行为过程做出准确判断，进而为学生提供合适的学习策略指引。

推动教育新基建要跳出技术逻辑

2019年，浙江金华一学校学生头戴“金箍”上课的视频引发关注。所谓“金箍”，是指检测脑电波的智能头环，检测结果用以评判学生注意力程度，分数还会被发给家长。

但是，此举很快引来舆论质疑，有媒体评论认为，太关注技术给教育带来什么，便会忘记教育为何出发。

“教育新基建面向未来，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雷朝滋表示，这个支撑体系将助力破解教育均衡、家校协同、师生减负等教育难题，推动教育模式变革、流程再造和生态重塑，有效提升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创新创造人才。“因此，推动教育新基建要跳出技术的逻辑，从教育生态构建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去勾勒发展蓝图。”他说。

刘铭认为，未来的教学环境将是人与智能技术高度协同的“人技”结合、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型教学环境，需要各方对教育新生态的理论、机制进行充分研究，指导教育和技术的“牵手”。

《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后，舆论普遍对新基建推进教育公平寄予厚望。新基建具有普惠性特点，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能够减小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

“新基建解决了信息传输通道的问题，就好比两个人分别在北京和广西，能够在同一时间看相同内容的《新闻联播》。”沈书生说。

但是，教育新基建不能仅仅停留在教室里多了一块多媒体大屏幕层次上，如果考虑不周、布局不当，有可能加大数字鸿沟。因此，同样的内容要有多种呈现方式，教育工作者必须研究受众对资源的需求，深度加工学习资源，满足不同受众对内容、形态和表征方式的需求。

“借助教育模式变革的东风，我们应从关注技术的教育应用转向关注技术的教育价值，从教学结构转向学习结构，从支持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到支持学习行为的决策。”沈书生说，未来教育新生态下，不仅要关注学习的结果，也要关注学习的效能，强调学习的适合性。

来源：科技日报

从 0 到 1 创业孵化机构如何点石成金

近年来，我国“产业孵化”“链条孵化”“循环孵化”“众包模式”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技术成果评估、科学实验、试制与检测等创新支撑服务正被越来越多创业孵化载体探索实践。在近期举行的北京创业孵育协会第六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来自政府、协会和业界的多位嘉宾结合实际，分享了对当前创业孵化发展的新观点和新看法。

行业呈现六大发展趋势

北京创业孵育协会理事长、韵网董事长颜振军介绍，当前，全国创业孵化行业正呈现“从企业孵化到产业孵化、从传统孵化到智能孵化、从单点孵化到创新街区、从孵化器到加速器、从粗放式管理到专业化管理、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六大发展趋势。

这些趋势，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其中，专业化管理、产业孵化、智能孵化成为多人共识。

在百放英库医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EO 单倍看来：“孵化器一定是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让专业的人和专业的机构，来做专业的事。”

北京即联即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赵晨则分享到，许多海外优秀项目回国之后，对如何找投资，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做创新，通过什么渠道找早期项目，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有培训和链接的需求。“很多国外公司都有计划在中国做创新中心，但是他们不清楚路径，特别需要专业服务。”

汇龙森国际企业孵化（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泳也认为，孵化器必须深入到项目里面去，与创业者形成紧密关系，真正与创业者一起成长。那种以载体为基础的单一的发展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探索推进源头创新成果产业

作为一个面向全球的原创新药研发平台，百放英库有许多和单倍一样，曾在美国呆过几十年，有技术、有能力、有情怀的专家。他们回国和高校老师合作，通过多种商业模式把源头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

“比如早期从想法转变为一个化合物时，它就已产生价值，可成立公司，或授权卖给其他方做临床。许多回国团队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后，后面资金跟不上；许多初创项目有投资追着跑，但他们没有时间从源头做……这些均可与百方英库合作。此外，一些项目进入市场或立项时，可通过百方英库的服务做可行性评估。”在单倍看来，“孵化是要从没有到有，将 0 转化为 1，之后从 1 到 10 或者 100 是可以加速的。没有孵化出来，是谈不上加速的。”

这些也获得多人同感。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发展司副司长陈宏生认为：“创业需要融合。原来的创业更多是社会独立个体，未来的创业可能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需要和创新源头紧密结合，让好技术和好创新尽快转化成产业。”

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北京北航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军建议成立一种组合，让高校研发团队和社会专业团队合作，进行共创。因为既是科学家又是企业家的人太少，老师开公司死的很少，但是半死不活的多。他还鼓励技术经理人积极参与。技术公司早期给技术经理人股份，企业的前 2-3 年技术经理人将成果与市场进行对接。经过 2-4 轮融资之后，技术经理人可退出，由职业经理人跟上继续经营。

期待给国有孵化机构“松绑”

“近期，协会将开展专业化引导政策研究等。”北京创业孵育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闫芳透露，“今年上半年，协会通过内训提升工作人员的各项能力，并走访调研孵化机构 75 家，完成多项调研报告并向相关上级管理部门提交多项工作方案。”

但目前，北京创业孵化体系建设仍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颜振军介绍：“一是产业布局不够合理。创业孵化机构远未覆盖重点产业领域；企业孵化的行业覆盖不足。二是空间布局有待优化。在孵企业区域分布与规划相关度不高。三是孵化能力有待提升。四是孵化绩效有待提升。在孵企业创新绩效较低，孵化机构投融资服务水平低。”

未来，如何更好地提升北京创业孵化体系能力？

颜振军建议，应当实施深度变革、提高孵化能级、完善孵化生态，政府市场齐发力、存量增量同推进，加快形成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主平台、以“三城一区”为主阵地，与科技创新体系、产业发展体系密切结合，要素完备、机制合理、协同活跃的北京创业孵化体系。

李军提到，国内的大学科技园曾投过一些项目，但是无法退出。是否有可能让大学科技园建立基金，按照基金的模式来操作，而不是以国有资产的方式。他希望中央层面设置的孵化机构支持资金可以真正地分配和支持到有需要的孵化机构，希望所有孵化机构能联合起来共同发展。

颜振军则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给国有孵化机构“松绑”。“目前市场上约有 30%的孵化机构是国有体制，他们大多有好地段、好载体、好团队，但是却被机制卡得死死的，遇到一些瓶颈，比如难以留住优秀人才，特别是按照目前的绩效评价体系，很少有人敢做投资。因此是否可以突破一点点，政府有关部门发个文，在绩效评价等方面有一点点松动，给大家多一些选择，让这些国有孵化机构发挥更多创新活力。”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新生代硬科技孵化平台正兴起



埃米空间培育硬科技产品



中孵高科创新医疗器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医疗设备开发实验室

从中城新产业集团在长三角区域首个智能硬件加速器落户苏州，到北京望京科技园与百度共建硬科技孵化服务平台；从位于中关村的全智能化配套硬科技孵化器创业空间正式开业，到光大香港创新中心正式向全球招募硬科技新秀企业……近期，全国各地正纷纷探索建立硬科技孵化平台，为硬科技企业提供更深入的服务。

“新形势下，对硬科技孵化平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具备硬条件、具有硬实力、掌握硬环节、发挥硬作用。”埃米空间 CEO 章品书表示，“这在某种程度上

会推动一批传统孵化器转型，催生一批新生代孵化器，对孵化器行业的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

以孵化技术实现产品化和产业化

在中孵高科产业孵化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孙践伟看来，国内重视打造硬科技孵化平台，和我国培养原始创新能力直接相关。“在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现，国内原创技术产品太少，受国外技术‘卡脖子’的关键原材料、产品和技术太多，这需要国内新一轮产业生态优化。”

自2010年“硬科技”概念被提出、2013年全国首家打造硬科技创业生态的中科创星诞生以来，全国各地积极打造硬科技孵化平台，助力硬科技企业成长。其中，中科创星打造以“研究机构+天使投资+创业平台+孵化服务”为一体的硬科技创业生态，为科技创业者提供投资、孵化及融资解决方案。

而新近成立的中城智能硬件加速器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产品销售细分为8大环节，通过线上平台链接全产业链资源，让硬核科技快速转化为产品；望京科技园依托百度人工智能生态服务体系，建设人工智能展厅，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平台、人工智能行业资源应用、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服务等功能板块落地；创伴空间与首创高科协同深耕，聚焦泛集成电路、5G+网络安全、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四大前沿科技领域，从创新源头出发，搭建服务体系……

“当前，全国各地建立硬科技孵化平台的做法很多，比如有的从龙头企业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落地布局入手，有的通过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入手，还有的通过产业投资资本入手……各地也因此形成了较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方法体系。”孙践伟表示。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关键

自2018年起，中关村管委会启动认定和支持硬科技孵化平台，埃米空间新材料产业硬科技孵化平台就是其中之一。

“埃米空间定位在新材料产业，集合了新材料技术产业化所需的要素资源和专业服务，为新材料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实施提供支撑和保障。”章品书介绍，埃米空间与北京科技大学分析检验中心共同建立线下分析测试服务平台，为新材料等相关领域科技研发项目和企业提供专业的分析测试和技术研发服务，并建立了集研发、办公、生产、检验检测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

在他看来，中关村多家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硬科技孵化平台帮初创企业解决了产品研发、资质申请、下游市场渠道、上游原料供应等关键问题。

中孵高科硬科技产业孵化服务平台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中孵高科以临床医疗器械综合孵化服务和院内制剂为切入点，投入3000多万元，在研发、中试、检测等关键环节搭建专业化公共平台，建成了有源医疗器械实验室、无源医疗器械检测实验室、精密加工打样中心实验室和中药院内制剂领域实验室。

“专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是中孵高科入选中关村硬科技孵化平台的一个基本条件。”孙践伟表示,“最开始,我们只提供设备服务。后来,我们又建立实验室,招募专业技术服务人员。近几年,中孵高科还投资专门做技术服务的平台型企业,让平台服务不断升级,形成了一站式技术服务平台和自有服务平台,并依托该平台集合了60余家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医疗器械的全链条服务能力。”

探索自身发展的特色之路

除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等配套设施之外,这些硬科技孵化平台也不断探索,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埃米空间在专业能力打造上持续投入、坚持做种子期项目投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进行逆向培育、突出特色打造核心竞争力。”章品书介绍,“近几年,埃米空间汇聚了一批新材料专业领域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能为初创新材料企业和产业化项目解决早期发展核心难题。埃米空间与几家新材料上市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围绕龙头企业产业布局定向挖掘和培育种子项目和初创企业,同时通过产业资源导入与赋能加快早期项目的产业化进程。”

未来,埃米空间将与产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为初创企业赋能;建立和培育一支工程化和产业化技术服务团队,为早期项目提供产业化研发服务;建立资本链条,为早期项目产业化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近几年,中孵高科在从项目孵化到企业孵化,再到产业孵化的升级过程中,更重视科技成果创新端的价值发现。”孙践伟表示,中孵高科陪伴甄选出来的成果方走完从概念提出到产品成型和上市的全过程,目前已筛选出15个科技成果,可预测项目整体市场容量超过180亿元。

孙践伟介绍,中孵高科将加大天使基金,设立更多专业基金;在已开发的大数据招商系统、精准孵化信息系统、园区智慧管理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筛选和培育项目资源,提升服务效率。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江苏创业投资》联系方式:

江苏省创业投资协会

地址:南京市虎踞路99号高投大厦辅楼302室

邮编:210013

电话:025-83303470

E-mail: jsvca2000@163.com

网址: <http://www.js-vc.org/>